

吳敬恒砥柱中流 (續完)

章君毅

遠走高飛逃到英倫

吳稚暉先生第二次和滿清官吏打交道的對方，是清廷駐日公使蔡鈞。光緒二十八年（一九〇二）夏天，吳肇甫（汝綸）就任北京大學前身——京師大學堂的總教習。他赴日考察教育，吳稚暉先生託他跟蔡鈞說項，保送蘇浙贛自費留學生九人進入成城學校，專攻軍事。蔡鈞答應了又翻悔，吳稚暉先生便和孫揆均帶了二十六名學生到公使館找蔡鈞理論，其餘的留學生也相繼起而聲援，雙方僵持了一星期，蔡鈞竟然卑鄙無恥的施出了殺手鐮，唆使日警驅逐吳稚暉先生出境，爲這件事更使他對滿清官吏全盤失望，不再寄予幻想。思想永遠進步，學問不斷革新的吳稚暉先生，終於決心奔走革命，推翻滿清。是年五月他和蔡元培先生回到上海，十月成立愛國學社，翌年正月他開始在張園安愷第會場公開發表演說。又以「蘇報」爲機關，照吳稚暉先生自己的說法是

：「鼓吹罷學，與夾帶革命，雙方並進。」

當中外矚目的「蘇報案」起，清吏搜捕頗急，吳稚暉先生揞着「昌言革命，煽亂謀逆」的「罪名」，在上海已經無法存身了。他方始在家人友好的勸促之下，遠走高飛，逃到英倫。不久，又獲友人張靜江（人傑）、李石曾（煜瀛）之助，將吳夫人袁雲慶女士，和女公子吳芙、男公子吳蕃，一齊送到倫敦去定居。

在倫敦住了一年多，直到光緒三十一年乙巳（一九〇五）春天，國父和吳稚暉先生首度晤見以前，吳稚暉先生是只有革命的行動，並無革命的宗旨。所以國父和吳稚暉先生在倫敦的會晤，可說是吳稚暉先生畢生志業的一個重大關鍵，同時也是我國國民革命史上，相當重要的一頁。吳稚暉先生曾經追憶的說過：他早在甲午（一八九四）那年，就曾在了一本洋人編的華文雜誌上，讀到國父「上李鴻章書」那篇文章。但是他却沒有記住作者姓名誰？次年乙未，他又披閱報紙，獲悉廣州出了一件「造反」的案子，從海

關上抄出許多槍枝，爲首者姓孫名「汝」。這就是滿清官方發佈的第一次革命——廣州起義新聞。清吏居心險惡的在國父的名諱之旁加上三點水，果然使猶在「八股先生」階段的吳稚暉先生，誤以爲他是「紅眉毛綠眼睛，最利害的公道大王」，甚至把他跟橫行浙江沿海的江洋大盜黃金滿誤認作同一個人。在此一時期，吳稚暉先生對革命的認識是三千多年以前歷史上湯武的故事，商湯伐夏桀，周武王滅夏紂，「湯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。」那是聖人的作爲，已見其二，便斷然不可再有第三次。後世之人倘敢侈言革命那就是「造反」，同於「強盜作亂」。

戊戌政變，變法維新，吳稚暉先生的思想已經漸漸趨向維新，當年三十三歲的國父孫中山先生，却已在海外完成了三民主義的輪廓。但是吳稚暉先生說他仍還不曾認識國父究竟有什麼「法寶」？一直到兩年後的庚子（一九〇〇），國父再度起義於廣東惠州，因爲革命先烈史堅如殉難，這才使吳稚暉霍然省悟「孫文不是尋

常的強盜」，他這個人一定有點來歷。從此，革命二字，在吳稚暉先生的心目之中，畢竟也可以登大雅之堂了。祇不過，吳稚暉先生這一項重大的轉變，最主要的關鍵，還是冲着史堅如是翰林公的兒子而來。普天之下，焉有翰林之子，會跟着「強盜造反」，鬧得來殺了頭的呢？

平生僅見偉大人物

又一年，到了辛丑（一九〇一），吳稚暉先



吳敬恆是一位人道主義者，他一生不坐人力車，有人送了他一輛，乃將車杆截去，當沙發坐。

生三十七歲，他到日本去留學，和南菁書院同學鈕惕生同行，兩人合住在東京神田區凌明館。有一天，一位成城學生湖北人吳祿貞，和一位學農的安徽革命同志程家樞，雙雙來訪。說是跟鈕惕生先生約好了同赴橫濱看孫文，問吳稚暉先生要不要同去？吳稚暉當下一聽孫文的名字，據他自己的形容是：「我雖不會駭成一跳，暗地裏却喫驚不小。」由於他先已聽說孫文和梁啟超，都在橫濱「上下其談論」，所以他回答吳祿貞等人道：「連梁啟超我都還不想去看他，何況孫文？」

充其量，一個草澤英雄，有什麼看頭呢？」

然而，吳祿貞、程家樞和鈕惕生，却不願和他引起爭辯，付之一笑，相偕去了。行前，跟吳稚暉先生約好，請他下午在淺草上野公園精養軒等他們回來，同進晚餐。吳稚暉先生那一天直等到傍晚時分，方始見到他們三位滿面春風的從橫濱回來。吳稚暉先生一見他們便問：

「怎麼樣？你們所見到的那位孫文，他是否像八蜡廟裏大王爺爺般的魁梧奇偉呀？」

鈕惕生先生正色的回答他說：

「您大大的弄錯了，孫先生是一位溫文爾雅，氣宇偉大的紳士。」

——鈕惕生是江陰南菁書院的高才生，連素稱頑固蔽塞的清吏梁鼎芬，都對他非常之賞識，由而他也獲得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器重。吳鈕二氏同窗共硯已久，相知頗深，吳稚暉先生曉得他平生從無一句妄語，聽他這麼說時，吳稚暉先生自承他曾為之大喫一驚。從此以後，國父在吳稚暉心目中的地位，便一躍而在太平天國的天王洪秀全之上，甚或可與漢光武帝劉秀，和光武帝的大司徒，中興漢室雲臺二十八將之首的鄧禹媲美，所以，當追隨國父頗久的程家樞再追問吳稚暉先生一句：

「你不相信他是革命領袖麼？」

吳稚暉先生便改用將信將疑的口腔，反詰他道：

「他比梁啟超如何？」

程家樞連連的搖着頭說：

「梁啟超不過是一介書生，我看他並沒有什



百年桎梏，一旦解除，中美中英簽訂新約後，吳敬恆與黨元老，軍政領袖合攝，左起第一排吳敬恆、林森、第四人徐宋、葛齡、于右任。第二排第二人王寵惠、何應欽、孔祥熙、戴傳賢、居正、孫科。第三排第三人宋子文、鄒魯、丁淮汾、吳鐵城。

麼特殊之處。」

這時候，鈕惕生先生便岔進嘴來，鄭重其事的再補充一句，他說：

「可惜你沒有見到孫先生，如果你見到了他，一定會出乎你的意料之外。」

吳稚暉先生曉得梁鼎芬最愛重鈕惕生，曾經保送他進入湖北陸軍小學，梁鼎芬尤將鈕惕生和陳景韓並稱二難。鈕惕生對梁鼎芬的道德文章，也是由衷的敬佩，而張之洞又是梁鼎芬的頂頭上司。因此，他便再作一比的問：

「梁鼎芬是個頑固人物，固不必論，難道孫文就有張之洞的氣概麼？」

他萬萬沒有料到，鈕惕生竟肯定的答以國父氣概遠在張之洞之上，他說：

「張之洞，大官而已，你怎可以拿他和孫先生相比？說到孫先生的氣概，總而言之，他是我生平僅見的人物，再也沒有第二個人可以企及。這一點，你將來見到了孫先生的時候，自會明白。」

至此，吳稚暉先生自動糾正了他的錯誤觀念，他不再中滿清官吏橫加污蔑的餘毒。却是，他說他仍然並不願意去見這位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革命偉人 國父孫中山先生。

於是又過了三年，吳稚暉先生僑寓英倫，他已經自認為不折不扣的革命黨。有那麼一天，吳稚暉先生的倫敦寓所有人敲門，打開門來一看，居然正是 國父孫中山先生。

原來 國父是在赴歐拓展與中會會務途中，道經法國巴黎的時候，打聽到了吳稚暉先生在倫敦的地址，特地前來會晤。

由於吳稚暉先生心目中對於 國父的印象早已截然改觀，所以當他乍見 國父的溫和端正，平易誠懇，居然毫無驚異的感覺。相反的，使他驚歎不置的反倒是 國父舉止的偉大，不可形容的，自然而然的偉大。吳稚暉先生曾經分析過：世俗所謂的偉大，若非有條件襯托出來的，便是虛驕浮夸的貴人氣，他說：

「昔子望見齊王之子，喟然而嘆曰：『居移氣，養移體。』魯居至宋，噤于垤澤之門，守門曰：『此非我君，何其聲之似我君？』與總理同時的一個李鴻章，在各國亦頗受偉大的稱譽。然而却無貴人氣的偉大，在地氈上唾痰，在旅館裏罵西崽，總理是沒有那種惡習慣，又或者有道學氣，嚴氣正性，不可濡彌，保持偉大的身份，與總理先後的，又有一個曾國藩。他的學養，不能不算偉大，但好像他做了我們的兩江總督，提倡勤儉，一時換不及衣冠，把灰布袍子，賣得比寧綢袍子還貴。總理就不注意這種矯枉過正。又或者有英雄氣，總理一生，當然革命了十來次，十三歲即想做洪秀全，然而並沒有暗鳴叱咤，像洪楊那種萬歲、九千歲的氣概。又或者有橫議氣，古代公孫龍、張儀，也有人稱過他們為大丈夫。總理一生，苦口婆心，見人即滔滔滾滾的指示他的主義，然而祇樸實的抒其所見，絕不肯用手段，見一人說一樣話。所以康有為自命『長素』，以為比孔子還長，然而為了利用，便設立孔教會，保

中國不保大清。又爲了利用起保皇黨。他自以爲議論偉大，終究止成了一個反覆的政客；總理却成爲眞實不二價的黨魁。世俗亦有以爲偉大者，或者能够擺出名士氣，總理一生研究的學問，够做一個大名士。然而他的好學，祇像周公孔子所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以集治國的大成。不像梁啓超談學派，講家數，有志維新，却終做了一個考據先生。因此總理品格偉大，終出於自然，也絕不必四十不動心，說大人則藐視之，下一番矜張工夫。他往來歐美，無論那一國的王公貴人，高人學士，都一見而心折，待之如最誠實的紳士。他絕對不拘什麼禮服，白領子等繁重儀式，而周旋亦自然中節。——

從紅眉毛綠眼睛的江洋大盜，到「品格自然偉大，度量自然寬宏，精神自然專壹，研究自然精博」的世界性最高貴紳士，「一個天生的偉人」，「一個天生創造主義的黨魁」，使人人敬佩到「五體投地」。吳稚暉先生對於國父的眞正認識，那是從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），國父上書李鴻章，吳稚暉先生初次讀到國父的名言議論時起，直到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

國父和吳稚暉先生在倫敦會晤，前後十一年間，吳稚暉先生由無錫而上海而天津北京，而東京而倫敦，思想不斷革新，學問迅速增進，再經過親眼目親，親身體驗所得來的。因此，乃在他心目之中成爲永遠顛撲不破的至理。

國父在抵達英倫訪晤吳稚暉先生之前，先已在比列時首都魯塞爾成立了與中會歐洲分會，有史青、賀之才、魏宸組等三十餘人加盟，在英

倫，則唯有孫鴻哲一位與中會員。縱使吳稚暉先生當年已因「昌言革命，煽動謀逆」的滅門之罪逃亡海外，而且他自己確也儼然革命黨，可是，國父和他的第一次會晤，却並不會提過希望他也加入與中會的話，甚至吳稚暉先生在晤見以後追憶，當時放言高論，大談革命的反倒是他自己。事後他也曾自忖：國父爲什麼不欲其早日加盟呢？據他的推想，可能有兩層緣故：其一是他的頭巾氣還很重，不像是個革命黨，因而使國父有隱拒於千里之外的感覺。其二則是國父具有眞知灼見，明知他的程度還不够躋身革命黨員之列。

時然後言樂然後笑

但是國父對於吳稚暉先生却殷殷相待，自然懇切，他邀他到康德黎老師的家裏去喫晚飯，把他介紹給康德黎老師及其夫人，並且言明他自己不日即將再赴美洲，請康德黎夫婦對吳稚暉先生客居英倫的一家大小，在遇有緩急時多多照拂。

這一年的六月十一日，國父離歐轉赴日本，七月十九日抵達橫濱，民前七年（一九〇五）八月二十日，陰曆七月二十日，星期日，中國同盟會舉行成立大會於東京赤坂區靈南日人阪本金彌宅，同年之冬，曹亞伯從東京到英倫，邀請吳稚暉先生加盟，吳稚暉先生立刻就慨然應允，正式入盟時，有曹亞伯、徐鴻哲在場，當曹亞伯出示盟書，吳稚暉先生看到誓詞之中有：「當天發

誓……」之語，他情不自禁的揚聲大笑，而且往後還曾坦承：「且作惡」，吳稚暉先生說：

「我們要革命就革命好了，何必去學那康有爲的行徑，發什麼富有票呢？」

曹亞伯在一旁聽了，瞠目不知所對。倒是孫鴻哲岔進嘴來，冷冷的說：

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？先生也曾聽過此一說麼？我是老早已經寫就這份盟書了。」

「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」一語，在當時確有醍醐灌頂之勢，使吳稚暉先生聽後先是一怔，繼而便大澈大悟，他立刻就寫好一份盟書交給曹亞伯。而且，從此以後他便打破了士大夫式的觀念，反倒竊笑梁啓超之輩的狼狽周章，俱爲頭巾所誤。

正式成爲同盟會員以後的吳稚暉先生，他對國民革命所作的重大貢獻是盡人皆知，必將永垂不朽的。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他和張靜江、李石曾兩位先生在巴黎組織世界社，創辦「新世紀」，自此以其淵博的學識，雄健的筆鋒，集中全力排滿、斥僞立憲，喚醒國魂，誠勉黨人，施保皇黨徒以致命打擊。他的至理名言，有「排滿革命，非種族上之問題，乃革命條件上之事類也！」「滿洲之僞立憲，保皇黨教之也；秀良之髦士，盡浮沉北京之郎署，保皇黨嫉之也；國內之新黨，由卑屈而成腐敗，保皇黨煽之也；海外之民德，由熱中而成媚官，保皇黨導之也！」他罵麻木的國人爲「猪生狗養」，向叛黨的敗類提出警告：「至於個人，果甲非而乙是，革命黨且共棄甲矣。果甲是而乙非，革命黨則又共棄乙矣

，區區數人，於革命黨之全體何涉哉？且革命黨亦樂取黨中之敗類，著其叛黨之罪惡，明告世人，以免其害羣！」在在都是那麼樣的大氣磅礴，痛快淋漓，至今讀來，猶仍令人血脈憤張，滿心振奮，吳稚暉先生當年的一支健筆，真不啻十萬黨軍。

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），八月七日，陰曆七月二十二，星期六，國父在第四次環遊世界旅



吳敬恆八十三歲時在滬寓寫石鼓文聯。

途之中，從布魯塞爾到了倫敦，第二天他就和吳稚暉先生見到了面，那一天是星期日，又值立秋，久別重逢，彼此都非常之高興。國父還跟吳稚暉先生及其公子吳霽，合攝一影留念，那一幀照片一直流傳至今，已成爲備極珍貴的國父旅途留影之一。

國父原定在倫敦就擱四五天，然後買棹赴美，可是因爲各方函電商洽，行期一延再延，直到十月三十日（陰曆九月十七日，星期六）方始啓程。這一回，他在倫敦停留將近三個月，整整十二個禮拜又八十四天之久。

在這一段時期之內，以吳稚暉先生和他過從最密，談得最多，吳稚暉先生也曾協助國父處理了不少重要事務。由於行程展緩，用費超出了預算，曹亞伯唯恐國父川資不敷，他在旅英同學之間，湊了四十英鎊，送到國父所住的旅社。曹亞伯把這筆錢留在桌上，然後與辭離去。國父認爲這是同志們對他的誠意獻納，因而也就坦然的收下。這一件小事，却使吳稚暉先生得到一項啓示，從而有所領悟，他曾在一次演講中說：

「總理在這種辭受，又毫不矯揉做作。想起從前孔子問孔文子（圉）的來使，問孔文子有什麼美德？使者回答道：『夫子時然後言，人不厭其言；樂然後笑，人不厭其笑；義然後取，人不厭其取。』孔子馬上有點不相信，說道：『是這樣的嗎？難道竟是這個樣的嗎？』孔子當時不大相信孔文子。我想孔子若遇到總理一定相信，相信他真有這種自然。」

然而，到了第二天，國父却用曹亞伯所獻的那四十鎊，買了一大堆的書，使曹亞伯見了，不勝驚異。他很着急的跑去告訴吳稚暉先生說：「我看先生恐怕連房錢都付不出了，他爲什麼要買這許多的書呢？」

吳稚暉先生却深深瞭解國父對於書籍的迫切需要，爲使他的主義更趨圓滿，爲使他的事業早日成功，國父必須對每一門新知，都積極研究到既博且精。因此他笑了笑說：

「你管他做什麼呢？他帶有箱子四五隻，却都帶些書。內中還有一部刻的資治通鑑，那是因爲他少君在舊金山留學，特地帶了去給他讀的。」

國事必問官不必做

在大黑暗中出現了一道曙光，終於到了辛亥年十月十日（陰曆八月十九，星期二）武昌起義，一戰成功，全球各地的炎黃子孫熱烈慶祝興奮若狂。十月下旬，國父從美國抵達倫敦，他在晚間八時往訪吳稚暉先生，可是吳稚暉先生却和張靜江先生相偕外出，國父便給他留了一張便條，約定翌晚八時再來相晤，信中有謂：

「近日中國之事，真是泱泱大國民之風，從此列強必當刮目相見，凡我同胞，自當喜而不寐也。今後之策，只有各省同德同心，協力於建設，則吾黨所持民權民生之目的，指日可達矣。」國父在倫敦下榻於薩福伊旅社，積極辦理外交事宜，吳稚暉、張靜江兩位先生，都是他的得

力助手。勾留半個多月以後，國父自英倫啟程赴法，會晤法國的老總理克里孟梭。行前他堅邀吳稚暉先生和石瑛回國。因為吳稚暉先生要到柏林打一轉，跟時在柏林留學的蔡元培先生見一次面，代表國父邀蔡元培先生返國任事。所以國父由朱卓文、李曉生兩人陪同先自馬賽啟程，而在十二月二十五日（陰曆十一月初六，星期一）到了上海。吳稚暉先生一行自意大利乘下一班船，十二月三十日（陰曆十一月十一，星期一）抵達，國父已在先一日當選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。兩天後的中華民國元年元旦（陰曆十一月十三，星期一），國父乘專車赴南京就職。吳稚暉先生則在元月四日方自上海到南京，他被迎迓到臨時大總統辦公室，地點就在國民政府旁邊參謀本部的那一排洋樓。

國父只用兩個房間，裏面一間充臥室，外面一間作辦公與會客之用。吳稚暉先生抵步，國父便邀他同室而住。在這時候他業已深以做官為戒，抱定了主張：「官是一定不必做的，國事則一定不可不問。」吳稚暉先生在大總統辦公處和國父同住四天，凡事一概從旁協助，堅拒委他一官半職。吳稚暉先生曾經談過他那四日間的所見所聞，他說：

「常來辦公的，有胡展堂（漢民）、廖仲愷兩先生，還有幾位不認識的華僑，也來寫外國文件，我在那裏四天，晚上祇有胡展堂先生，與他（按指國父）商量明天應為之事，我在傍靜聽，他吩咐胡先生，胡先生終是唯唯，然而到明天辦了以後，胡先生晚上來報告，不照他吩咐的，

似乎很多。然而總理更好像依他做的一樣，點頭認可。大約他發見辦得不錯，不必全照己意，而且也並不分別出來，明說雖非我意，辦得也好，防人以後不照己意。古人所謂：『樂取于人以為善』，我讀書時不大明白他的用意，見了總理的任使胡先生，才明白這是極贊聖哲的度量。這種待人處事，一切自然的寬宏大度，也決非光用學力得來，而是有天賦的德性在內。」

吳稚暉先生又曾談過：國父辭卸臨時大總統，舉袁世凱以自代，那以後專心一志，埋頭國家建設時他的見聞所及。他說：

「他（按指國父）民國元年，把大總統讓給袁世凱，他也希望袁世凱有一點天良，對待中國穩妥的做去，讓他趁這個當口，在十六年中，完成了二十萬里鐵道再說。所以他辭了大總統，情願做鐵路督辦，決不是尋一個事體，養養身體，拿點薪水來休息的。他是熱心要把二十萬里鐵道，彈指實現。他在上海立了一個鐵道督辦辦事處，我也到過好幾次，終是地圖攤滿了一地，自己伏在地圖上，拿鉛筆東畫西畫。凡是鐵路工程的圖書，每間房間都堆着，他又研究到自然精博，決不肯含糊的。可惜他第一條想造的路是條欽渝鐵路，借款也已經成功。不料自己的黨人上了袁世凱的當，在參議院反對借用外債，而且不久宋教仁案子也出來了。他知道袁世凱決不是一個東西，二十萬里鐵道也決不是當時所能造成。所以把第一條要造欽渝鐵路的合同，印在他實業計劃的後面，作一個歷史式的紀念，就興起二次革命。現在不說別的，單講那條欽渝鐵路，當時

若完成了，便於現在的西南交通，又如何？」

吳稚暉先生從「陋儒式」的「八股先生」，到引領在時代之前的先知先覺，同盟會員，然後再由革命聖人、開國元勳而「官必不做，國事必問」，就凡夫俗子的「人之常情」而言，委實有點令人莫測高深，不可思議，够得上稱為他畢生傳記中最富傳奇意味的一段。然而我們却不可忽略，吳稚暉先生對於國父博大精深的政治理想瞭解之深刻，與乎自然偉大的行誼仰慕之衷誠。因而他確能以活潑潑的天機，生生不息的精神，擇定了他盡瘁終生的目的，探求宇宙的奧秘，從而擴大人生的價值，用科學支配自然，再以受支配的自然增進人類福祉。他致力於提倡科學與工藝，同時並以勤工儉學的方式培育人才，使中國早日成為現代化的泱泱大國。此所以，吳稚暉先生是一位大哲學家，也是當代屈指可數的一位社會改革家哩。（全文完）

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購買
合訂本請將書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
一四〇四四帳戶，或寄郵票交台北
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或撥電話
七二四八〇，即可收到書刊。